

社会资本下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战振海¹, 姜会明^{2*}

(1. 吉林省税务干部学校, 长春 130062; 2. 吉林农业大学, 长春 130118)

摘要: 社会资本下乡是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本文对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的功能定位及其主要发展领域进行全面分析, 提出社会资本下乡应立足“农”的发展定位, 突出推进乡村绿色发展, 着重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强化增进农民生活福祉; 社会资本下乡应突出“企”的发展主题, 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创新金融产品服务, 创建信息共建共享; 社会资本下乡应遵循“融”的发展路径, 创新户企融合发展机制,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建立全面新型城乡融合关系。

关键词: 社会资本下乡; 立足“农”; 突出“企”; 遵循“融”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877(2020)06-0095-05

Research on the Path that Social Capital to the Countrysides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 Zhenhai¹, JIANG Huiming^{2*}

(1. Jilin Provincial Tax Cadre School, Changchun 130062; 2.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8, China)

Abstract: Social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s the new driving for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agriculture and countryside, and its main development field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social capital should be sent to the countrysid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agriculture’, giving prominence to promoting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s efforts to increase farmers’ well-being. Social capital to the countryside should focus on the theme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reating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ng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create information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It should also follow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tegration’, making innovations in the mechanisms for developing household-enterprise integration,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which will promote each other and integrate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to the Countryside; Based on ‘Agriculture’; Highlight ‘Enterprise’; Follow ‘Integration’

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 乡村资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 农村土地资源效率未充分发挥。乡村发展离不开城市资源的推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是吸聚城市中的社会资本下乡, 带动城市的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与乡村丰富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禀赋相结合, 实现“城乡融合”“产业融合”与“户企融合”, 走融合发展之路。为此, 迫切需要完善社会资本下乡政策措施, 加快构建社会资本下乡的有效路径,

着力破解社会资本“下乡难”的困境, 与此同时, 规范社会资本下乡的“垃圾项目”及对农户投资的“挤出效应”。

经典学者曾对外部要素进入农业农村有过预见性的思想和论述。列宁强调通过合作制给农民信贷与文化教育、推进农民和国家利益相结合^[1]; W·舒尔茨认为要打破传统农业农民世代代使用相同生产要素而形成的经济均衡, 改造传统农业, 关键是引入现代生产要素^[2]; A·恰亚诺夫提出农民农场有其生命力和稳定性, 其未来发展是垂直一体化^[3]。在我国, 关于社会资本下乡的研究及其文献, 主要见之于改革开放以后, 尤其是近十几年来, 集中在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利弊、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等方面。钟树杰指出社会资本下乡可有效化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

收稿日期: 2019-04-16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2017A13); 吉林省科技厅科技战略与规划项目(20200101094FG)

作者简介: 战振海(1969-), 男, 高级经济师, 研究方向: 财政与税务。

通讯作者: 姜会明, 男, 博士, 教授, E-mail: jhm573@163.com

境^[4];张红宇等提出应鼓励和提倡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产前投入品、产中的技术服务以及产后的流通及加工^[5],刘国斌等提出了三产融合^[6],王琦琪则进一步提出政府应鼓励社会资本下乡投资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数字乡村建设、“厕所革命”等领域^[7];陈义媛、高强、蒋云贵等学者指出了目前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存在“非粮化”“非农化”倾向等对农户投资的“挤出效应”问题^[8-10]。贾晋等认为,小规模资本主要以‘公司+农户’的商品契约形式,较大规模资本则适宜通过‘企业+基地+农户’的要素契约形式进入农业^[11];何秀荣指出中国未来农业微观组织以企业租赁式和农地股份制的公司农场为主要形态,‘公司+农场’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最佳选择模式^[12];张晓山指出社会资本下乡主要采取“公司(企业)+农户”“公司(企业)+基地+农户”“订单农业”等实践模式^[13];石敏等利用有序logit模型通过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分析,得出工商资本倾向于选择“公司农场”组织形式^[14];杨志武等从农业经营主体视角讨论了对社会资本需求^[15];秦中春提出要为社会资本下乡牵线搭桥,强化社会资本下乡进村的社会责任,重点引导和促进社会资本采取开放式、参与式、融合式、包容式的乡村建设方式^[16]。

综上所述,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历史看,当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工商资本、金融资本进入是大势所趋。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问题已经提出了诸多思考,取得很多共识。本研究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功能定位及其主要发展领域进行全面分析,揭示社会资本适宜进入农业哪些领域,政府该限制什么、放开什么及社会资本下乡的可行路径。

1 社会资本下乡是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人才、资金、技术是不可或缺的要害。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导致农村资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严重,2018年2.87亿农民工进入城市,致使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妇女化,县域金融对农村农业贷款趋于弱化,农村生产力水平发展不充分。实现乡村振兴,人才、资金、技术从哪儿来?迫切需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特别是吸聚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热情和活力,集聚人才、资金、技术向农业农村流动。乡村绿色发展、农业质量提升、农民福祉提高,未来的农村将充满生机和商机,为社会资本下乡提供

了稳定有效且充足的潜力空间。

从农村角度来看,无论是R·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的理论,还是罗森斯坦·罗丹大推动理论,抑或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都强调资金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我国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农村内部之间由于地理区位优势不同以及资源分布不均匀等原因而造成区域整体差异,表现在东南部沿海地区由于外资引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西部内陆地区发展水平较低,由于自然气候条件不同带来的南北部差异也很大。城乡之间由于产业特征、经济政策等不同,虽然相对差异长期呈现缩小的趋势,而绝对差异却有扩大的趋势。农村内部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基础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交通状况等不同而产生不平衡。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农村内部差异导致资金、人才、技术流动偏离弱势区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尤其在县城、乡镇和村的道路、垃圾和污水处理、厕所改造、环境治理等方面投入严重滞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在财政资金不足情况下,亟待引导社会资本下乡,投入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厕所革命”。

从农业角度来看,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相互交织,土地在农业生产中既是劳动对象又是劳动手段,土地面积具有有限性特征,不能随着资金投入要素进行相应调整,导致农业资金投入报酬递减,为保持农业产出连续增长,决定了对农业投资的倍加需求;随着农业劳动力转向二、三产业,农业机械化的使用,机器替代人力,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决定了对农业投资的持续需求;随着社会分工,农业与其产前、产后联系更为紧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成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在国外称为食品纤维系统,国内称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出现,决定了对农业投资的连锁需求。农户限于资本的缺乏只能作为农业生产者,难以向农业前项、后项产业链条延伸,需要社会资本下乡推动农业前项、后项产业发展。

从农民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还占31%,全职青壮年农业劳动力比重已降至10%,农民平均年龄超过55周岁,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村劳动力仅占20%左右。尽管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但这主要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城乡收入相对差距有缩小趋势,但绝对差额仍有所扩大,由于农民受

自身素质约束,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加之经营规模的细小,农村缺少成规模、带动性强的特色产业,致使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实现连续稳定的高增长面临困境,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来源单一,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有递减趋势^[17]。农户内部收入不平衡,少数农户的高收入掩盖了多数农户收入增长缓慢的真相,我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只有1 000元,而这部分人口绝大部分集中于农村。由于农业存在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贷款监管成本较高,金融机构不愿向农村投放贷款,加之缺少抵押物,农户往往难以达到金融机构的抵押贷款要求而望贷兴叹,资金短缺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瓶颈。

尽管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但这远不能满足农业农村发展所需。社会资本下乡直接为农业农村投入资金,一方面可以改变资金从农村到城市单向流动,扭转农村资金净流出的局面,改善乡村振兴投资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以其自身拥有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可在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中发挥示范作用,提高农村闲置资源利用效率,形成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动能。

2 社会资本下乡助力乡村振兴的规范框架

2.1 社会资本下乡应立足“农”的发展定位

社会资本投资到农业农村关键是能够“按图索骥”,找准产业定位,与农户投资合理分工,重点从事农民干不了、干不好、干不经济的领域,主要从事产前与产后领域,而把产中种养环节留给农户投资,避免社会资本投资的错位与越位。

(1)社会资本下乡应突出推进乡村绿色发展。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乡村绿色发展需求不断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在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循环化绿色发展前提下,放宽农村公共服务机构准入门槛,积极发展探索建立政府与社会合作共建和政府购买公益服务等机制,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生活性服务业,着重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县城、乡镇和村的道路建设、垃圾和污水处理、厕所改建、环境治理等为重点,大幅度提高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回收处理率、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率,努力降低农业能耗、水耗、地耗,推进化肥、农药施用减量化,提高生物安全治理能

力,增进生产和消费绿色化水平,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社会资本下乡应着重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把社会资本与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结合起来,构建“科技战略联盟+技术创新基地+综合科技服务”平台,引导社会资本依托农业园区投资农牧良种(种苗)、新肥料、新农药、畜用药、畜用药械、畜用配合饲料,推动传统农业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鼓励社会资本下乡投资适合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现代种业、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支持社会资本下乡开展土地托管、联耕联种、代耕代种、统防统治等直接面向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18],发展服务规模经营和土地规模经营,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方面的引领作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坚守耕地保护底线,严禁耕地非农化,加强对社会资本下乡租赁农户承包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实施均衡补贴政策,绝不能依赖高补贴推动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尊重农民自主决策权益,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监督和政府部门外部监控^[19],扎紧耕地保护的“篱笆”,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

(3)社会资本下乡应强化增进农民生活福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政府部门应该引导社会资本与村集体、农户开展股份、租赁、流转等合作发展,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鼓励社会资本建立“企业+合作社+农户”或者“企业+家庭农场”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20]。支持社会资本通过签订订单合同、提供土地托管服务等方式,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应探索构建多元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推动社会资本与合作社、小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关系,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带动农民分享农业产业链增值收益。既要富了老板,又要使农民分享社会资本下乡发展红利,多途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切实保障社会资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权益。对社会资本下乡后的运作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控,防止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和半拉子工程等“垃圾项目”。

2.2 社会资本下乡应突出“企”的发展主题

政府要为社会资本下乡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深度挖掘农村自然资源、农户经济资源、村

民社会资源、政府财税资源等大数据的潜在价值,着重搞好规划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提升投资效率和企业生产效率,做到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分类指导、加强协作、形成合力,使社会资本下乡获得稳定有效的盈利空间,扎实推动社会资本下乡创业兴业。

(1)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畅通社会资本下乡通道。设立社会资本下乡准入门槛,要求地方政府摸清本地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因地制宜引进合适的“资本”下乡。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责任,建立城乡联动、部门协调的推进机制。把握乡村的多样性、差异性、区域性特征,做好社会资本下乡规划。加强农村软环境建设,实行乡村“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的行政审批和服务流程,打好政策牌、亲情牌、特色牌,使社会资本下得来、留得住、可盈利。

(2)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社会资本下乡动力。国家要在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方面对社会资本下乡给以政策支持,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要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发挥财政资金乘数效应;完善和创新社会资本下乡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切实改进对社会资本下乡的金融服务,对社会资本下乡实施差异化利率定价,完善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简化贷款手续、降低融资成本。整合现有的资金渠道,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为社会资本下乡提供上下游的供应链融资,用于支持下乡建设原料生产基地和农产品加工业,积极开展农产品存货、畜禽活体仓储抵质押业务,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权,农民房屋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完善农业信贷担保、增强涉农贷款可得性。

(3)创建信息共建共享,降低社会资本下乡风险。围绕“农资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抓好“互联网+农业”,促进互联网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实现农业的可视化和数据化,推进农业生产向智能化迈进,提高农业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通过建立规范、标准的农业市场信息发布网络体系,及时发布统一、权威的市场行情及预测预警信息,借助种养大户、农业行业协会、经纪人、村组干部搭建信息桥梁,带基地,连农户,发挥其信息集散地的功能。引导农业经营主体按照市场信息开展合理的农业经营决策,有效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和投机性^[20]。保险公司应逐步扩大农业农村保险覆盖面,积极创新符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多层次高保障保险产品,扩大收入

保险覆盖率,细化保险品种,实行分类保险。

2.3 社会资本下乡应遵循“融”的发展路径

社会资本下乡既要保护工商企业本身逐利性的利益,更要保护好农民利益不受损害,要建好社会资本下乡的“防火墙”。鼓励城乡优势要素加快流动、互补融合,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1)创新户企融合发展机制。鼓励涉农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县城、特色小镇、中心村延伸,培育一批乡村车间、手工作坊、家庭工场。推行“农户+龙头企业+现代服务业+社区服务”,升级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推进农业农村改革集成发展,加强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社会资本资源整合,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实现合作方互利共赢。在此过程中,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依法维护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2)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坚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引导社会资本开发农业后项产业,利用丰富农产品资源,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打造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延伸产业链、锻造价值链、提升利益链,拓展农业附加值;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发展集文旅农业、康养农业、休闲农业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提升农旅、农文、农教融合;鼓励社会资本开展“互联网+现代农业”,推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发展,发展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可视农业等新型业态,提高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21]。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3)建立全面新型城乡融合关系。实施城镇村群落化与产业集群化融合工程,以县城为中心、特色小镇为支撑、中心村为节点构建城镇村群落化城乡体系;加强资金、用地、人才等政策引导,鼓励社会资本与乡村集体合作经营小镇,大力推动村企对接,延长、拓宽产业链,形成具有较高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打造一批“电商村”“休闲村”“网红村”等特色小镇。

参考文献:

- [1] 列宁.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1-572.
- [2] 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165-167.
- [3] 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34-236.
- [4] 钟树杰.用社会资本提升乡村治理水平[J].人民论坛,2020(8):82-83.
- [5] 张红宇,襍燕庆,王斯烈.如何发挥工商资本引领现代农业的示范作用—关于联想佳沃带动猕猴桃产业化经营的调研与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11):4-9.
- [6] 刘国斌,董俊杰.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研究—以吉林省为例[J].东北农业科学,2020,45(2):67-71.
- [7] 王琦琪.社会资本“下乡”去哪儿[J].农村工作通讯,2020(10):33.
- [8] 陈义媛.遭遇资本下乡的家庭农业[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6):24-26.
- [9] 高 强,孔祥智,邵 锋.工商企业租地经营风险及其防范制度研究[J].中州学刊,2016(1):43-48.
- [10] 蒋云贵,瞿艳平.土地流转、工商资本与投资农业风险—来自湘鄂地区的实例验证[J].江汉论坛,2017(12):21-25.
- [11] 贾 晋,艾 进,王 珏.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的路径选择: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问题探索,2009(12):164-168.
- [12] 何秀荣.公司农场:中国农业微观组织的未来选择? [J].中国农村经济,2009(11):4-16.
- [13] 张晓山.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N].农民日报,2014-10-30(001).
- [14] 石 敏,李大胜,谭砚文.交易费用、组织成本与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组织形式选择[J].农村经济,2017(10):57-63.
- [15] 杨志武,杨 展,李 庆,等.农业规模经营主体金融需求测度分析—基于熵权TOPSIS模型和黑龙江483个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样本的调查[J].东北农业科学,2020,45(1):63-67.
- [16] 秦中春.四大举措建构社会资本下乡良好环境[J].农村工作通讯,2019(8):53.
- [17] 姜会明.农户兼业经营问题浅议[J].经济纵横,1990(9):50-51.
- [18] 杨文光,陈 伟,朱俊峰.乡村振兴视野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与适应性研究[J].东北农业科学,2020,45(4):124-128.
- [19] 姚雅男,孙 雨,吉宇琴,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风险控制路径[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7(18):5,7.
- [20] 姜会明.中国农业合作制的创新和发展[J].吉林农业大学学报,1992(1):70-73,78.
- [21] 王 博,刘 豪,林 杰,等.山西省农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陵川县农业发展规划调查[J].东北农业科学,2019,44(4):104-109.

(责任编辑:王丝语)

.....

(上接第81页)

- [4] 梁 娟,叶 漪,杨 伟.不同氮素形态及配比对天门冬生长和品质的影响[J].中国土壤与肥料,2018(1):28-31.
- [5] 梁 娟,胡海丽,杨 伟.不同供氮水平对天门冬生长和品质的影响[J].中国土壤与肥料,2016(1):53-56.
- [6] 朱孟炎,于博帆,陈华峰.外源硝态氮水平对长春花生理代谢的影响[J].植物研究,2016,36(4):535-541.
- [7] 刘大会,朱端卫,郭兰萍,等.氮肥用量对药用菊花生长及其药用品质的影响[J].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12,18(1):188-195.
- [8] 欧小宏,张智慧,郑冬梅,等.氮肥运筹对二年生三七产量、品质及养分吸收与分配的影响[J].中国现代中药,2014,16(12):1000-1005,1014.
- [9] 宋希梅,汤 利,陈军文,等.连续两年不同施氮对三七产量和皂苷产出量的影响[J].中药材,2017,40(10):2256-2261.
- [10] LIU Dahui, LIU Wei, ZHU Duanwei, et al. Nitrogen effects on total flavonoids, chlorogenic acid,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the medicinal plant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J]. 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 and Soil Science, 2010, 173(2): 268-274.
- [11] 赵 英,何忠梅,杨世海,等.人参需肥规律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研究[J].人参研究,2016,28(5):2-6.
- [12] 陈 佳,金红宇,戴 博,等.化肥施用对人参品质影响的观察[J].中药材,2012,35(6):847-850.
- [13] 余前进.不同施肥模式对三七生长及有效成份的影响[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5.
- [14] 宋希梅,朱永全,卢迎春,等.基于“3414”的三七氮磷钾施肥量研究[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19,36(1):16-25.
- [15] QU Chenling, BAI Yuping, JIN Xiangqun, et al. Study on ginsenosides in different parts and ages of *Panax quinquefolius* L. [J]. Food Chemistry, 2009, 115(1): 340-346.
- [16] ZHANG Kun, WANG Xiao, DING Lan, et al. Determination of Seven Major Ginsenosid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Panax quinquefolius* L. (American Ginseng) with Different Ages [J]. Chem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2008, 24(6): 707-711.
- [17] Starratt A N, Hendel J G, Reeleder R D. Leaves of North American ginseng, *Panax quinquefolius* L.: A renewable source of certain ginsenosides. [J]. Canadian journal of plant science, 2000, 81: 65-67.
- [18] 杨 雨.西洋参茎叶皂苷类化学成分的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14.
- [19] 孙黎明,邢 鑫,李 波,等.不同参龄的文登西洋参对氮磷钾三元素需求试验研究[J].特种经济动植物,2015(10):35-37.

(责任编辑:刘洪霞)